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刘伟江^A, 丁一^A, 杨雪^B

(A.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B.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本文对我国吉林、青海、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个体因素对选择外出或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有显著的影响;家庭中人口数量及老年人数量在1%的水平下促进男性劳动力外出,女性劳动力则受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的影响;另外,本文还重点就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个体就业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与吉林省相比,青海省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劳动力外流造成过度阻碍,直接增加了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压力;而贵州省则正好相反,劳动力的过度外流直接导致土地抛荒等问题,同时也造成了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建设中人才缺失的窘境;在本地非农市场发展方面,青海和贵州省的乡村因素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本地非农经济发展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 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Multinomial Logit 模型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4-129X.2015.02.011

【文章编号】 1004-129X(2015)02-0102-11

【收稿日期】 2014-11-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口迁移与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关系研究(13BRK023)

【作者简介】 刘伟江(1967-),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丁一(1988-),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杨雪(1969-),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市场经济逐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但与全国相比其整体经济水平仍相对落后,存在着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目前,少数民族地区仍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2011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集的八个省份中,农村贫困人口数为3 917万人,占这八个省份中农村户籍人口总数的26.5%,同时也占全国农村扶贫人口总数的32%;另外调查还显示,在这些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占该地区农村户籍总人口数的比例较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高出13.8个百分点。其中一些地区囤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另一些地区

劳动力流失严重,甚至出现了土地抛荒、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问题。当前,城镇化作为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动力,对这些民族地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缓解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压力问题,有效配置民族地区劳动力资源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我国经济平稳有序增长的重要问题。^[1]因此,对民族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制定合理的政策有效地调节各民族地区劳动力资源在城乡间的配置是促进此类地区长远发展,缓解我国内陆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改善地区就业压力等问题的重要手段。^[2]

农村劳动力流动在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缓解土地及就业压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贫困问题,增加了家庭福利;而劳动力的回流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并将城市的生活方式、习惯传播到农村。^[3]但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民族地区劳动力的流失也存在着诸多消极影响。首先,青壮年劳动力和优秀人才的流失限制了地区经济长期发展。阮荣平(2011)基于人口流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证实了人口流动对输出地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而留守劳动力的老化和匮乏也导致土地抛荒现象时有发生,对农业结构调整造成了影响,阻碍了城镇化建设。^[4]其次,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在提高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城市失业率问题。最后,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流失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造成了消极影响。随着人口的流动,民族地区受到外界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正逐渐失去市场,遭遇传承危机。因此,政府在制定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动政策时要全面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以及大中城市就业压力问题。

二、文献综述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对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例如,都阳(1999)对农村迁移劳动力进行研究,发现教育、培训及专业技能在劳动力迁移决策及收入的提高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5]段成荣(2000)通过使用 Logistic 模型回归证实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及婚姻状况等个人信息均在个体的迁移决策中起到显著作用;^[6]朱农(2002)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的影响,结果显示迁移概率与年龄呈倒 U 曲线,文化程度对男性迁移的推动力较大,土地资源的短缺是促使迁移的推力,家庭因素阻碍了妇女的流动;^[7] Knight and Song(2003)使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研究;^[8]周皓(2004)通过对第五次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目前家庭迁移是农村个体迁移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家庭因素也同样在决定劳动力外出中起到作用;^[9] Lall、Selod(2006)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如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家庭因素及本地经济等因素均对劳动力的流动选择产生影响。^[10]但在现有研究中,针对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环境进行比较研究的相对较少,同时详细分析性别变量如何影响民族地区劳动力就业选择的研究更为欠缺。其中朴光星(2009)对朝鲜族个体跨国流动进行分析,认为走出国门的朝鲜族并没有“各自为政”,而是在移居地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新的城市族群共同体,并通过血缘、地缘等关系网络建构了全球性社会网络;^[11]张善余、曾明星(2005)对不同的少数民族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了不同民族迁移分布的特点与趋势;^[12]邹逢佳(2006)对苗族个体流动选择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迁移特征为农业生产型迁移,以劳动力迁移来谋生,以他们在种植养殖方面的技术来获得生产发展;^[13]王化波、王鑫(2011)对影响延边地区朝鲜族个体迁移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育龄妇女对稳定朝鲜族人口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基础教育加大了人们的迁移倾向。^[14]为了更充分地对不同民族地区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加以比较分析,本文分别选取了吉林、青海和贵州三

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数据,通过构建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对其选择外出、本地非务农或务农工作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充分考虑不同民族地区之间存在的经济、环境条件差异及乡村固定效应对劳动力个体外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劳动力样本按性别进行划分,分析了性别变量对个体就业选择的影响,同时还对男性和女性样本的估计结果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比较分析。^[15]根据最终的回归估计,本文对不同省份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出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三、数据与模型

1. 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2011年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三类地区(生态脆弱、陆地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研数据,从中选取了吉林、青海和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数据进行分析。选择吉、青、黔三个省份的数据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从地域分布来看,上述三个省份分别位于我国的东北部、中西部和南部地区;从经济状况来看,2011年吉、青、黔三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7 510.0元、4 608.5元和4 145.4元,分别体现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吉林省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好,所以在下文的比较中,我们以吉林省作为参照样本。数据处理删去重要数据缺失、在校学生及丧失劳动能力的样本后,样本包含了来自35个乡村的17 708个个体,其中12个乡村3 797个个体来自于吉林省,15个乡村6 977个个体来自于青海省,其余则来自于贵州省。在总样本中女性个体有8 114个,男性个体有9 594个。发生流动的个体占总样本的23.28%,其中男性外出个体占了总流动样本的57.58%,总体上男性劳动力的流动性要大于女性劳动力。

通过对不同性别劳动力年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表明,外出劳动力年龄主要分布在25~34岁之间,而随着年龄增长劳动力外出概率下降,55岁以上劳动力流动所占比例最小。对男性和女性的样本进行比较发现,女性外出劳动力的年龄整体上要大于男性,这可能是由于部分女性劳动力外出是跟随流动,要晚于家庭中的男性。对于留在本地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个体加以统计发现,女性劳动力多数集中于25~44岁年龄段,而男性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的个体则在16~55岁间分布较为平均。本地务农劳动力分布状况男性和女性几乎一致,均主要分布在25~54岁之间。将外出、从事本地非务农和务农劳动三者进行比较发现,没有外出的劳动力年龄整体上要大于外出的劳动力。特别是外出样本中24岁以下劳动力所占比例明显高于没有外出样本中同年龄所占比例,而本地农业劳动中55岁以上个体所占比例又明显高于外出或从事非农业劳动中同年龄个体所占比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

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农业劳动力中小学文化水平的劳动力所占比例要明显高于外出或从事非农业劳动中同学历所占比例,其中女性样本尤为显著。相反高学历如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事农业劳动个体所占比例则非常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另外,在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样本中,女性受教育水平整体上高于男性,这是由于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劳动力只有在边际生产率更高的情况下,才可以由从事农业劳动转为从事非农业劳动,而在我们的样本中,男性平均受教育水平要略高于女性,所以,在没有发生流动的劳动力中女性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的概率较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地区农业女性化问题的出现,阻碍了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的发展。

通过对吉、青、黔三省劳动力就业选择进行统计分析表明,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所占比例最高,吉林省外出和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的人口所占比例非常接近为29%左右,而青海和贵州省则不同,青海省外出劳动力所占比例较小,贵州省非农业劳动力市场则较为落后,劳动力流失情况相对严重。

2. 变量选取

本文通过个人、家庭和乡村信息对个体的劳动决策进行分析。其中,个人信息包括年龄(age)、受教育程度(school year)和婚姻状况(married)。当前,大部分实证研究证实由于个体的外出成本会随着其年龄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年龄对个体外出的倾向存在消极影响,而对个体选择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存在正向影响。另外考虑到年龄效应可能存在方向上的变化,所以文中还引入了年龄的平方项(age^2)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研究。个体的受教育水平通常被认为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促进作用。最后,对于劳动力的婚姻状况本文选用了虚拟变量进行描述,将没有配偶的劳动力作为参照表示为0,而有配偶的劳动力则定义为1。

家庭信息包含了家庭中人口数量(family size)、人均土地数量(landing)、学龄前儿童(pre-school children)及老年人(old person)数量。由于土地数量的增加会增加个体外出或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从而抑制个体流动或从事非农业劳动;而家庭中人口数和劳动力数量则会促进个体外出,家庭中存在剩余劳动力则可以通过外出务工的方式增加家庭收入,既增加了收入的多元化又减少了收入来源过于单一的风险;另外,家庭中儿童和老年人数量对个体从事劳动所起到的作用方向并没有统一的结论。文中将5岁及以下的个体视为儿童,而60岁及以上的个体定义为老年人,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儿童和老年人的数量对个体流动和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影响方向取决于其是否增加了劳动力个体流动的成本。一方面儿童的增加需要父母的照顾会抑制其流动,同时,为了满足子女的物质需要也会促进劳动力流向边际生产率更高的劳动市场;而对于老年人,一方面劳动力要留守照顾父母,但另一方面若父母身体健康、可以承担农业劳动或照顾子女,则又会促进劳动力流出或从事非农业劳动。因此,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儿童和老年人数量对劳动力个体的影响方向也会不同。

乡村变量包括乡村从事非农业劳动人口比例(off-farm)和乡村人力资本水平变量(edyear)。其中乡村人力资本水平变量根据Rauch(1993)和Acemoglu and Angrist(2001)中所使用的方法,通过乡村劳动力个体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进行度量,尽管这种度量方法只是使用了平均值,但却给出了乡村劳动力生产水平的整体状况。^[16-17]另外,乡村从事非农业劳动人口比例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成熟程度。一方面本地非农业劳动力市场越成熟,则整体劳动力平均收益越高,也就增加了个体外出的机会成本,从而抑制了劳动力的外流,另一方面,本地劳动力市场越成熟,竞争越激烈,劳动力个体越倾向于外出寻找更多工作机会,同时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劳动力个体外出的成本就越低,也会促进个体的流动。^[18]

3.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多元Logit模型(Multinomial Logit)对劳动力选择外出、本地务农或本地非务农工作的概率进行回归估计。^[19]因变量为虚拟变量,其中我们选择农业劳动的个体视为参照组,定义为0,而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的个体定义为1,最后将外出的劳动力定义为2。而 P_0 、 P_1 和 P_2 则分别表示选择三种劳动的概率,它们均介于0~1之间且和为1。这三种概率间的具体关系可以通过如下线性形式表达:

$$\ln(P_1/P_0) = z_1 = \sum \beta_{1i} x_i \quad (1)$$

$$\ln(P_2/P_0) = z_2 = \sum \beta_{2i} x_i \quad (2)$$

其中, β_{1i} 和 β_{2i} 分别表示第 i 个解释变量 x_i 的估计系数。以上两个等式就可以得出三者概率间的关系, P_1 和 P_2 的关系可以通过 $\ln(P_1/P_2) = \ln(P_1/P_0) - \ln(P_2/P_0)$ 来获得, 不需要再进行估计。另外, 还可以通过概率的形式更为直观的进行表述: 根据式(1)和(2)可知 $P_1 = P_0 * \exp(z_1)$; $P_2 = P_0 * \exp(z_2)$, 又由于 $P_0 + P_1 + P_2 = 1$, 所以经过变换可以得到以下形式:

$$P_0 = 1 / \{1 + \exp(z_1) + \exp(z_2)\} \quad (3)$$

$$P_1 = \exp(z_1) / \{1 + \exp(z_1) + \exp(z_2)\} \quad (4)$$

$$P_2 = \exp(z_2) / \{1 + \exp(z_1) + \exp(z_2)\} \quad (5)$$

与一般的线性模型不同, Logit模型的估计方法并不是简单最小二乘估计而是使用极大似然方法通过迭代得到估计值。而在模型估计结果的解释方面, 多元Logit估计系数相对复杂, 因此常通过计算每个系数的边际效应进行解释分析。边际效应计算的方式很多, 本文采用了Zhao(1999)的方法, 通过设定连续自变量取均值, 而虚拟变量为0, 再计算概率曲线斜率。^[20]

四、模型估计结果

1. 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个体选择本地农业劳动为参照, 通过多元Logit模型对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 具体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估计结果发现大部分变量对个体选择外出的影响显著, 而只有较少的因素对个体选择本地非农业劳动有较为显著的作用。

分析发现, 对于男性劳动力而言受教育水平和本地从事非农业劳动个体所占比例的增加均会显著地促进个体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由于个体受教育水平增加, 提高了个体从事其他劳动的能力, 进而促进了劳动力资源流向收益率更高的行业; 而乡村从事非农业劳动个体比例的增加则说明了本地非农业劳动力市场的成熟程度增加, 当该市场较为成熟时, 降低了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成本, 增加了其就业机会, 从而促进个体从事非农业劳动。而对于女性劳动力而言, 则另外受到年龄和本地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年龄的影响存在方向上的变化, 在个体达到某一年龄前,

表1 全样本估计结果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off-farm	mig	off-farm	mig
个人信息				
年龄	0.032	0.167***	0.056**	0.079***
年龄的平方	-0.001**	-0.003***	-0.001***	-0.002***
婚姻状况	-0.100	-0.822***	-0.192	-0.623***
受教育程度	0.185***	0.107***	0.118***	0.094***
家庭信息				
家庭人口数	-0.058**	0.113***	0.006	0.143***
学龄前人口数	0.141*	0.046	-0.171**	-0.171***
老年人口数	-0.073	0.198***	0.079	0.245***
人均土地数量	0.009*	-0.005	0.003	-0.012
乡村信息				
乡村人力资本水平	0.026	0.214***	0.141***	0.295***
非农劳动人口比例	0.053***	-0.013***	0.055***	-0.003
R ²	0.253	0.253	0.256	0.256
样本量	9 594	9 594	8 114	8 114
乡村数量	35	35	35	35

注: ***表示该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10%的水平下显著。



随着其年龄的增加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概率增加,而超过这一年龄后,则会产生抑制作用。与男性样本不同,本地人力资本水平显著地促进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业劳动,这在一定程度表明在我国民族地区女性劳动就业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整体文化水平的影响。^[21]家庭中学龄前儿童的数量对男性和女性劳动力的作用方向相反,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男性个体从事非农业劳动,而在5%的水平下抑制女性从事非农业劳动。

对劳动力外出选择进行分析发现,回归中大部分变量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个体的外出决定。对于男性和女性样本,各因素在影响方向上基本一致。随着劳动力年龄的增加会促进个体外出,而在年龄达到某一极值时则会对流动产生抑制作用;个体受教育水平、家庭中人口数量及老年人数量也均会促进劳动力流出;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对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外出选择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别,对男性而言学龄前儿童的影响作用不显著,而对于女性劳动力这一变量则在1%的显著水平上抑制个体外出。可见在民族地区中,子女因素主要是对女性劳动力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是负向的。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变量在本文的估计结果中对劳动力的流动虽然起到了抑制作用,但这一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劳动力流动的理论认为,当劳动力拥有土地数量增加时,会增加其流动的机会成本,从而抑制个体外出,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这一现象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受到民族地区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能力的影响,即使增加土地数量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的增加也不能明显地超越劳动力外出所带来的收益的增加。最后,本地非农业劳动力市场的成熟程度会抑制劳动力的流出,但这一影响仅对男性劳动力显著,对女性劳动力则不明显,这可能由于多数女性劳动力的流动属于跟随流动或因婚姻外出,所以受到本地劳动力市场成熟程度的影响并不明显。^[22]

尽管上述估计结果描述了平均受教育水平和非农业劳动力市场成熟度两个乡村信息对民族地区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但仍存在着一些估计问题,我们忽视了部分未观测到的乡村信息,例如乡村收入水平、通信及交通发达程度、各民族地区特有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等变量对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还有这些遗漏变量与平均受教育水平和非农业劳动力市场成熟度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引入了乡村虚拟变量来描述整体乡村效应。所研究的35个乡村中,为了避免多重共线问题,将其中一个乡村的效应定义为0,其他34个村庄以此为参照。再次进行估计,个人及家庭信息变量的估计结果在影响方向和显著性上与之前估计结果一致,为简洁起见在表2中仅给出乡村变量的估计结果,分析结果发现乡村效用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高估计的准确性,我们再次对数据进行检验发现,青海省的5个乡村存在极端情况,其中乡村1中所有劳动力均从事非农业劳动,不存在从事农业劳动或外出的个体;乡村2中则是不存在外出的劳动力;乡村3和乡村4中则完全没有女性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乡村5中的男性劳动力均从事农业或本地非农业劳动,没有个体外出。这些极端情况的样本会对估计的准确性造成影响,因此,将这5个特殊的乡村样本删去,仅保留其余的30个乡村样本构成简化样本。

简化样本并未对个人及家庭变量估计系数的方向及显著性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的男性个

表2 全部样本乡村效应回归估计结果

乡村效应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off-farm	mig	off-farm	mig
平均效应	0.626	-0.915	-0.441	-0.920
最大效应	22.989	3.788	21.981	4.07026
最小效应	-2.686	-18.223	-16.289	-17.409
R ²	0.332	0.332	0.335	0.335



表3 子样本乡村效应回归估计结果

乡村效应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off-farm	mig	off-farm	mig
平均效应	0.119	0.130	-0.085	-0.307
最大效应	5.278	3.829	5.915	4.105
最小效应	-2.281	-3.809	-3.111	-4.086
R ²	0.262	0.262	0.268	0.268

显著地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决定外,其他变量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但乡村效应的估计范围则有明显的改善。此外,男性和女性样本乡村效应的显著性也存在差别,参数估计结果在表3中给出。对于男性样本而言,全部多元回归结果中有31个乡村效应系数在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而女性则只有26个系数显著。这一结果表明,乡村因素对于民族地区男性劳动力就业选择影响的显著性要高于女性。

2. 乡村效应模拟分析

考虑到多元Logit估计系数在对结果的解释方面较为复杂,当前研究大多数采用变量的边际效应来对其进行分析,所以本文通过作图的方式对某一特定设定下劳动力个体就业选择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行研究。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外出概率与年龄和受教育水平间的关系,并对二者进行比较。其中假定乡村效应为0,虚拟个体无配偶,家庭人口数为4人且没有学龄前儿童和老人,人均土地数量为2.5亩,图1中个体受教育水平设为7年,图2中的个体年龄假定为36岁。图中虚拟情况下个体同年龄和同一受教育水平的女性劳动力外出概率均大于男性劳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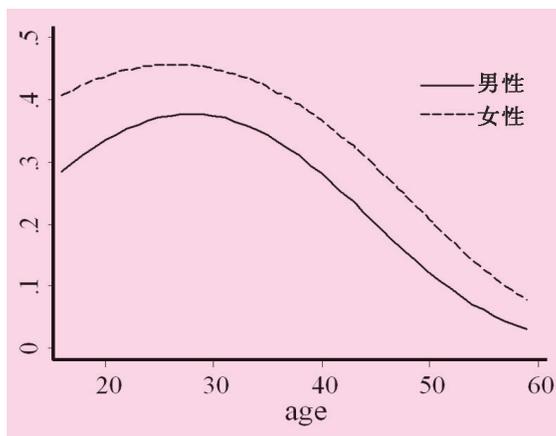


图1 外出概率与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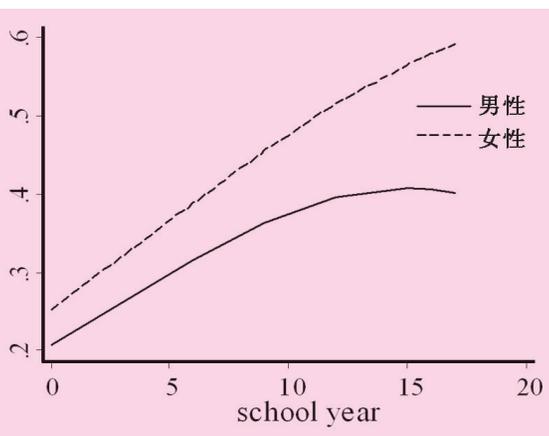


图2 外出概率与受教育水平

图1中男性劳动力在25岁外出概率最大而女性则在27岁左右实现最大外出概率。同样劳动力随着个体受教育水平的增加外出概率增加,且在受教育水平达到12年后,男性劳动力外出的概率基本维持稳定,而女性劳动力外出概率则随着受教育水平的增加不断增加最后高达0.6左右。这表明个人及家庭情况类似的男性和女性劳动力个体中,女性劳动力外出的意愿更为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地男性结婚难的问题,甚至由于婚育年龄的单身女性外出概率较高而造成了一些光棍村

出现,在吉林省延边地区甚至还出现了连续多年的人口负增长问题。^[23]同理,更改所设定的变量值也可以对不同情况的劳动力个体外出概率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可以通过更改年龄的设定具体分析在婚育年龄的劳动力个体的受教育水平与外出概率的关系;还可以对特定设定下劳动力个体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概率与年龄等自变量的关系进行分析。

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对乡村效应的分析上,在男性样本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估计等式中,乡村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在5.278~-2.281之间变化,外出等式中其估计系数在3.829~-3.809之间,而女性样本的估计结果则分别为5.915~-3.111和4.105~-4.086之间。具体对不同的乡村效应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再次考虑上述的劳动力设定情况,假定个体为男性劳动力,无配偶,家庭人口数为4人且没有学龄前儿童和老人,人均土地面积为2.5亩,其所在乡村对个体外出的影响效应为0,定义为基本乡村,再假设存在个人及家庭情况相同的个体分别属于影响效应最大和最小的乡村。通过比较这三个人及家庭信息相同、但乡村信息不同的个体,对我国不同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的就业选择情况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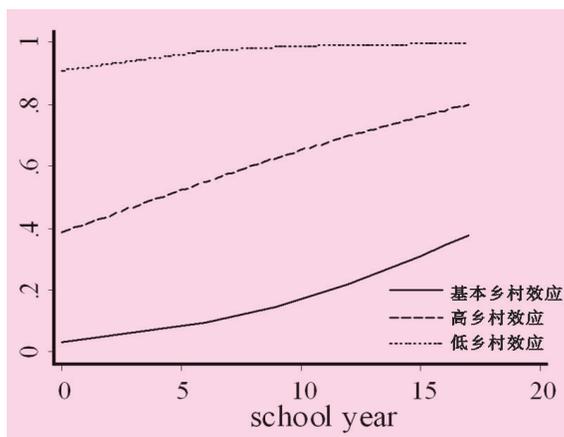


图3 非农业劳动概率与受教育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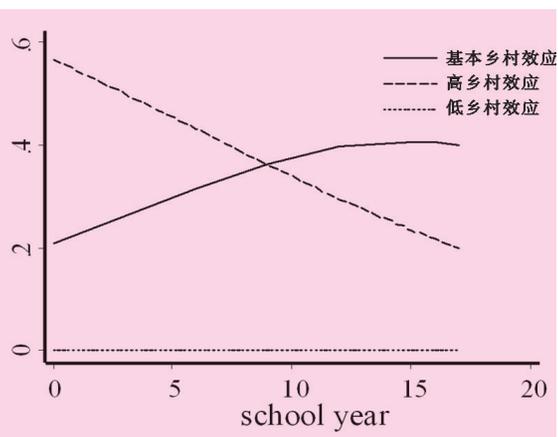


图4 外出概率与受教育水平

图3和图4中分别给出了在三种乡村效应水平下男性劳动力从事非农业劳动或外出劳动的概率与其受教育水平的关系,其中劳动力的年龄依旧设定为样本均值36岁。如图3,随着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选择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的概率也不断增加。在低外出效应的乡村中我们所假定的劳动力个体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概率高于其他乡村中相同的个体,而其外出的概率在所有受教育水平下均近乎为0,可见对我们所设定的劳动力来说,这一低效应地区相对闭塞,个体流动障碍较多,多数男性劳动力仍主要从事农业或本地非农业劳动;高乡村效应地区中的个体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外出概率下降,且在个体完成义务教育后,其外出概率低于基本乡村中相同个体的外出概率。对虚拟的劳动力而言,该乡村中本地劳动力市场相对成熟,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个体流失数量较少。另外,我们也同样对女性劳动力进行了相同的研究,得到的劳动力外出及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的概率与其受教育水平的关系与男性基本一致。但在低乡村效应地区的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业劳动概率随受教育水平增加的幅度较小,最大只达到0.2附近,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外出概率则有小幅增加,这说明,与男性劳动力相比,这一地区的女性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力,本地非农业市场对女性开放程度较低。由于不同乡村间个体外出和从事非农业劳动概率的差距较大,所以即使劳动力的个人

及家庭等因素设定发生变化,例如年龄不再设定为36岁,对其就业选择与受教育水平之间关系的影响也较小,这也再次证明了乡村效应的重要性。所以政府在制定流动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不同省份、不同民族地区所特有的地区特征,例如本地劳动力市场成熟度、地区人口结构、义务教育普及程度等等。

在我们的设定中,最高效应和最低效应乡村恰好分别来自吉林省和青海省,而基本乡村则属于贵州省。其中,吉林省所有乡村的效应最大值为3.829,最小为-1.025,青海省的乡村效应范围在1.387~3.809之间,贵州省乡村效应范围为1.557~-0.784,虽然不能简单地以乡村效应的高低来区分省份,但对三省所有乡村的效应值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劳动力外出方面,吉林省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外出的乡村效应的均值为1.066,标准差为1.330,其中小营、英安两地主要为朝鲜族居住地,其人口流失较为严重,除去这两个乡村后吉林省乡村效应的均值为0.575,标准差为0.801;贵州省民族地区劳动力外出的乡村效应的均值为0.626,标准差为0.705,各乡村外出系数差距较小;青海省的10个样本地区中只有一个地区的系数为正,其他乡村效应均为负,且均值为-1.296;而在对从事非农业劳动概率估计的结果中,乡村效应方面吉林、青海、贵州三省的均值则分别为0.580、-0.365和-0.655。总的来看,因为三省中吉林省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所以我们以吉林省作为参考进行比较,发现青海省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劳动力外流造成了过度的阻碍,直接增加了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压力,同时这种相对封闭的劳动力市场也不利于地区的人才培养和长期的经济发展;而贵州省则正好相反,劳动力的过度外流则直接导致土地抛荒、农业女性化等问题,同时也造成了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建设中人才缺失的窘境;在本地非农市场发展方面,青海省和贵州省的乡村因素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其中贵州省尤为严重,本地非农经济发展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五、结论

本文通过多元Logit模型分别对我国吉林、青海和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地区的男性、女性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与其个人、家庭和乡村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根据实证结果得到以下结论:

个人因素中年龄、年龄的平方和个体受教育水平对所有个体外出或选择本地非农业劳动均有显著的影响,而婚姻状况仅对劳动力的外出决定产生抑制作用,并不会对其选择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产生影响;家庭因素影响劳动力选择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显著性不高,对男性劳动力而言,家庭人口数量和老年人数在1%的水平下促进其外出,而女性劳动力还要另外受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的影响,儿童数量的增加会抑制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

乡村因素在个体就业选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根据不同地区特有的乡村效应特点可以实施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改善地区劳动力就业分布。

首先,青海省大部分民族地区社会因素对劳动力外出存在过度抑制作用,劳动力流动障碍较大。同时相对于其他地区,该地区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青海省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现代化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外出务工渠道,提高留守人员福利,普及现代化农业技术等方式促进个体流动。同时在本地非农市场中为女性劳动力提供更多岗位及技术培训,提高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就业机会。以促进劳动力外流并回流的方式在短期内直接通过外出人员汇款提高本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吸纳更多的外来资金和文化技术,不断完善本地非农就业市场,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以达到快速提升本地区的工业化及城镇化水平。



其次,贵州省民族地区的问题则主要突出在乡村因素对个体从事非农劳动的抑制上,导致了当前该地区的贫困程度较高。贵州省民族地区乡村因素促进个体流出,但抑制了本地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失,地区经济发展停滞,虽然短期内可以通过汇款等方式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但地区长期发展的动力不足。政府可以通过普及义务教育,扶持本地民间企业、鼓励个人创业、吸引投资等方法不断完善本地就业市场。另外也可以通过引进人才和鼓励劳动力回流的方式,为本地的经济发展吸纳更多的人力资本。

最后,吉林省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其劳动力外流和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的影响较为均衡。但还应不断的对其就业结构进行调整适应当前新型的产业结构,不断地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为地区工业化、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人力保障。另外,吉林省部分朝鲜族聚集地区当前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朝鲜族劳动力的大量流失,自1996年开始甚至出现了连续十几年的人口负增长,朝鲜族个体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与韩国相近,因此许多个体选择跨境迁移,其中许多婚育年龄的女性通过婚姻方式迁入韩国,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应应对朝鲜族劳动力的具体特点进行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参考文献】

- [1] Chan K W. The Chinese Hukou System at 50[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9, 50(2): 197-221.
- [2] Liu Z.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8, 19(3): 521-535.
- [3] 石智雷,杨云彦. 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J]. *社会学研究*, 2012, (3): 8.
- [4] 阮荣平,刘力,郑风田. 人口流动对输出地人力资本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 (1): 83-91.
- [5] 都阳. 贫困地区农户参与非农工作的决定因素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1999, (4): 33-37.
- [6] 段成荣. 影响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分析——兼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性[J]. *人口研究*, 2000, 24(4): 14-22.
- [7] 朱农. 论收入差距对中国乡城迁移决策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2002, (5): 10-17.
- [8] Knight J, Song L. Increasing Urban Wage Inequality in China[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3, 11(4): 597-619.
- [9] 周皓. 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 2004, 28(6): 60-69.
- [10] Lall S V, Selod H.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urvey of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and Empirical Findings[M].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6.
- [11] 朴光星. 跨国劳动力流动与中国朝鲜族的全球性社会网络[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5): 18-24.
- [12] 张善余,曾明星. 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动与人口迁移形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J]. *民族研究*, 2005, (1): 17-25.
- [13] 邹逢佳. 少数民族群体人口迁移现状分析——以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和平乡搬迁户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S1): 159-164.
- [14] 王化波,王鑫. 延边朝鲜族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 2011, (2): 69-74.
- [15] Y. Yang X, Guo F.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terminants of 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A Multilevel Analysis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9, 33(4): 929-953.
- [16] Rauch J E.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the Citi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3, 34(3): 380-400.



- [17] Acemoglu D, Angrist J. How Large are Human-Capital Externalities? Evidence from Compulsory-Schooling Laws[M]. MIT Press, 2001:9-74.
- [18] 蔡昉. 劳动力流动, 择业与自组织过程中的经济理性[J]. 中国社会科学, 1997, (4): 127-138.
- [19] Willmore L, Cao G Y, Xin L J. Determinants of Off-Farm Work and Temporary Migration in China[J].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2012, 33(2-3): 161-185.
- [20] Zhao Y.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2): 281-286.
- [21] 张世伟, 赵亮.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生存分析的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19(4): 101-106.
- [22] 王智强, 刘超.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11, (1): 56-61.
- [23] 刘伟江, 丁一, 等. 延边朝鲜族劳动力外流及其影响研究[J]. 人口学刊, 2014, (1): 97-104.

[责任编辑 韩淞宇]

The Determinants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Minority Regions

LIU Wei-jiang^A, DING Yi^A, YANG Xue^B

(A.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B.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in minority regions in Jilin, Qinghai and Guizhou Province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age education and marry statu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abor migration and off-farm employment. The variable of family size and old person have high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abor flow, female migration is additionally affected by the number of pre-school child.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rimarily focuses on the rural effect on individual employment choices across different minority regions. Compared to Jilin Province, people in rural areas in the Qinghai Province are under greater pressure to remain in their own regions, increasing employment pressure during urbanization; Guizhou Province has experienced the opposite, and excessive outflow of labor has directly resulted in land abandonment problems, and created a lack of talent with regards to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rural effect in Qinghai and Guizhou has also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non-agricultural economy; lack of local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ill hinder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in said regions.

Key Words: Minority Regions, Rural Labor, Migration, Multinomial Logit Model